

产生于东汉末年,融合荆楚文化与巴文化,曾流行于达川区百节镇一带,一度销声匿迹

异类泥人道再现江湖

□ 本报记者 龚其明 摄影报道



表演道具

不久前,记者在达川区百节镇玉龙村胡家大院子目睹了“泥人道”的排练和表演。这是50年后“泥人道”再现江湖。

2008年,若不是市、区文化部门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泥人道”或许从此就从江湖上销声匿迹了。

50多年前,在达川区百节镇流传着一种极其珍贵的民间艺术,它就是产生于东汉末年,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间舞蹈“泥人道”。

据75岁的百节镇退休教师李开萍介绍,他爷爷那辈人常表演“泥人道”,他10多岁时也跟着大人跑龙套,对“泥人道”表演的全过程有很深的了解和记忆。1945年前后,百节镇一带表演“泥人道”的有三四拨人,每拨有七八人、十多人不等。李开萍退休后,他根据爷爷口口相传的内容,对“泥人道”的资料进行了整理。

东汉末年兵荒马乱,夔门一带的楚人因躲避战争和瘟疫,逃至达川区境内的百节、景市、赵家、石板一带,以带柄棕叶、牛胛骨、短木棍、竹筒笙、秸秆、竹篾条、苕麻、胡萝卜等为道具,表演祭祀、喜庆类民俗舞蹈,这就是“泥人道”。

李开萍听他爷爷说,“泥人道”最早曾在南外镇的草街子表演过,一帮乞丐经常在那里跳“泥人道”,所以又叫讨口子舞、乞丐舞。

表演“泥人道”时,艺人们需赤身裸体,剃成光头,头部、脸部和身上全部用黄泥巴涂满各式各样的花纹,寓意天人合一、保护

土地、风调雨顺。再戴上草编头圈,胸前佩戴小骨头项链,双手戴木圈子,下身穿草裙,在头部中央插一根胡萝卜,以示“红运当头”,五谷丰登。表演者在竹筒笙等吹打乐器的伴奏下,随着音乐的节奏,时而横跳,时而后跳,时而翻跟斗,动作粗犷豪放,充满阳刚之气。演员们不断变换队形和姿势,刚劲有力的舞姿,充分显示出男子汉的剽悍、敏捷、矫健和力量;在不停地翻、滚、跳、跃的同时,用木棍敲打牛胛骨,用棕叶驱赶妖魔,口里念叨着:“泥人到,泥人到,泥人到了福就到;妖魔鬼怪被赶跑,六畜兴旺人欢笑……”以祈求平安与吉祥。

“泥人道”的演出方式灵活,演出场地不受局限,既可在街头施展,也可在院坝和田间地头表演;有晚上表演的,也有白天表演的;表演以男性为主,多则12人,少则6人,以各类动物的跳跃姿势为基本表演动作。

李开萍说,“泥人道”受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影响,一度没人再敢表演。最近几年,市、区文化部门抢救“泥人道”制作技术,又让“泥人道”回到劳动人民中间。目前,百节镇拟把“泥人道”表演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起来,适度开发利用,形成经济效应。

达川区文化馆一位负责人说,“泥人道”源于一种民间传统的新神仪式,它形象地反映了化身为“泥人”的劳动人民对自然、对神力的抗争态度,是巴文化中的又一异类,是荆楚文化与巴文化融合的典范,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用棕叶驱赶妖魔



用短木棍敲打牛胛骨



表演者口中念叨道:“泥人到,泥人到……”

吹奏竹筒笙

□ 段玮

秋高气爽,空气清新,午饭后的喧闹开始了,渠县新市乡街上充满了人们的欢声笑语。

吃完饭,筷子一放,老爸便出车了,妈妈则忙碌家务活。妈妈喜欢热闹,更喜欢家庭的温馨、干净。她一边擦抹桌、椅、窗,一边讲述她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妈妈叫熊秀贞,1963年出生在渠县新市公社三堡大队一生产队,在家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三个弟弟。

“像我小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我们会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哦!那个时候生活紧张,一大锅可以照得出人影的稀饭,一家7口人一扫而光后都还想吃,哪像现在这么多的肉和菜吃不完。”妈妈说到这里,望着远处陷入了回忆。

儿时的妈妈处于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个缺少少穿的年代,妈妈餐餐碗里都是土豆、红苕、菜叶子,有时碗里有了少得可怜的米粒也快乐得不行,看到别人家吃白米饭心里更是羡慕得要死。

妈妈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外公外婆总是想办法弄到肉、米,那可是妈妈最欢喜的时候。

孩童时候的妈妈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跋山涉水翻过骡子坡走到南充市蓬安县的段家沟去割猪草,生怕别人抢了先,为的是把圈里的猪早点养大喂肥,年底杀肥猪才有嘎嘎(肉)吃。

“该杀的南霸天!”孩提时候的妈妈,看场坝坝电影更是稀奇的事,只要听说哪儿有坝坝电影放,就往哪儿跑。无论是广安市的花桥镇,还是南充市的福德镇,妈妈都会和她的小伙伴们一起徒步走过去看。为了能够最好地看电影,妈妈和她的小伙伴们都会选择最高的片断,生怕有人把屏幕给遮住,自己错过了精彩的地方。每次回家时都是深更半夜,也没有黑夜的恐惧,因为一路上都在与玩伴们讨论电影里的情节,充满了欢声笑语。那时的电影有《红色娘子军》《地道战》等,而妈妈最爱的就是《红色娘子军》,每当看到南霸天欺负吴琼花的时候,就会一直咒骂南霸天。看到琼花一次次反抗、逃跑,一次次被抓回来,被打得遍体鳞伤,最后还被关入了水牢,妈妈就心疼得不得了。当琼花率领娘子军与主力部队会合后重新解放了椰林寨,罪大恶极的南霸天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妈妈就会跟着大人们拍手叫好。就算到了现在,妈妈也时常怀念那时的坝坝电影。

母亲

母亲的少女时代

孩童时期的妈妈特别勤快,忙完了家务,一有时间就跑去洗马滩玩,看见有人在那里洗衣服,便会走上前去帮她们洗,她们觉得妈妈手脚麻利,偶尔会给妈妈钱,有时候妈妈一个月可以挣两块钱。有了钱的妈妈,会把一小部分钱拿去买自己最喜欢的糖吃,其余的都会交给外婆贴补家用。那时的妈妈可逗外婆喜欢了。

妈妈的故事很多,回忆酸酸甜甜,有的故事似乎有些苦涩。改革开放以来,像妈妈一样的人们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快乐幸福地生活,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现在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

天才少年

去年六月,大巴车从四川省工商局峨眉山疗养基地清爽而又略带寒意的晨雾中出发了,向峨眉山金顶方向驶去。我受命对渠县工商局的老领导牟道夫作人物专访。

一路上,年龄悬殊三十多岁的我们无话不谈,家庭、事业、过去、现在、欢乐、苦闷……不知不觉中话题将我带进了牟道夫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之中。

很久以前就听人说过,84岁的牟道夫早年是一位天才少年,这话在他的成长经历中得到了验证。

牟道夫出生于广安安岳县一户农家,祖上几代人都是读书人,家里还有三十担谷子的田地。到了他父亲那一辈人的时候,因为几代人都没能读出个名堂,读书的热情也就渐渐地淡了下来。可是,家庭对牟道夫的影响是很巨大的,他五六岁时就在二叔门下读私塾,七八岁就能通背四书五经。

那时的旧中国,已有一些新的观念和进步思想在人群中悄悄地生长和蔓延。牟道夫是个追求进步的人,他偷偷地来到堂哥任教的新学堂读书,入学几天就能把书上的语文课文全部背下来。老师说:“你这个样子我没法教你了,你到乡上去读高小吧。”于是,他插班到乡高小二年级,自他来到这个班后,每次考试第一名的名字便换成了牟道夫。

1945年秋天,12岁的牟道夫开始上初中。开学不久,家里传来了哥哥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的消息,若要取人,就挑三百担谷子换。牟家哪去找这三百担谷子呢?牟道夫因此被迫辍学。第二年,他再次来到学校读书,其间巧遇决定自己命运的两位老师,正是这两位资深的地下共产党员,把革命的火种播撒进了牟道夫的心田。

革命青年

有一天,刚刚下课的牟道夫被一个人叫到操场边,说是要有要紧的事。此人是“伪乡长”家里染房管账的先生邓朴玉。“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坏人,其实我和乡长都是好

人,你晚上到乡长家里来,我们有事跟你商量。”三更时分,煤油灯下的“伪乡长”给他讲了很多关于阶级剥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理,牟道夫听得入耳入心。

不久后,牟道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放牛娃出生的牟道夫,入党后做了大量地下工作,比如送信、传递消息、掩护同志等等。他说,送信是他的拿手绝活儿,再长的信只需看两遍就记住了,不管路程有多远都能一字不落地把收信人背出来。

除了记忆好之外,牟道夫年轻时的体力也是超群的,一个人可以对付三个同龄人。有一次,他正在坡上放牛,赶场的大路上来了三个人,挑着麻糖挑子摇头晃脑地从他眼前经过。已有对敌斗争经验的牟道夫一眼看出他们并不是什么正经的生意人,很像搞侦察的国民党特务。思索片刻,他以挡了牛路为由故意与对方发生摩擦,并趁机狠狠地教训了那三个人。

从警受伤

1950年夏天,组织上安排他去位于重庆磁器口的公安学校学习(现西南政法大学的前身)。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的社会知识和专业知识。学校准备把他分配到任务繁重、情况复杂的重庆市公安局工作,一向胆大的牟道夫胆怯了:“让我在农村搞公安工作没问题,可我要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来对付那些‘城里人’,心里没底。”后来,他被分配到大竹专区公安处工作,大竹撤专区后,又来到了渠县公安局工作。

解放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活动猖獗。牟老给我讲了一个自己中枪的故事:“这是一个夏天的中午,侦察科刘科长从支农一线回来,说有一股特务常在渠县县城周围活动,我们在城后山梁上守了半个月了。”牟道夫带上美式二号左轮手枪和另一名同志蹲点布控。

到了点上后,他听到有枪栓拉动的声音,顺势抬手开枪推弹上膛。突然,啪的一声枪响,他感到自己从前右胸到后背一阵清凉,一股热血喷在了苞谷叶子

上。不好,中枪了!他顺势倒在地上,用手捂住枪眼。后来得知,这一枪不是特务开的,而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执勤民兵开的,相关人员后来分别受到了处分。

由于子弹从肺部穿过,流血过多,县医院院长摇着头说:恐怕不行了。领导和医务人员急得团团转,原达县地区公安处连夜把医生和药品送到渠县,抢救了10多个小时他才总算脱离了危险。“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未等伤痊愈我就出院了,接着又前往上海搞外调,在外工作了半年多。因为未能及时进行后续治疗,导致我的听力和视力严重下降。”

巧追货款

1991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渠县矿业公司经理提着一瓶“汉碑”牌白酒来到渠县工商局大门口,硬拉着已是该局副局长的牟道夫喝酒。酒过三巡,经理说:“我想求你个事儿。”牟道夫听了半天才明白,矿业公司向武汉一家经销商销售了两个火牛皮的100余吨原煤,由于缺乏经验,合同上的发热量定得过高,对方拒绝付款。

牟道夫把桌子一拍:“你就算不是我的朋友,我也要帮你嘛,损失的可是我们渠县人民的钱啊!”在武汉的那十多天,是牟道夫最难受的日子,从合同约定来看,对方并无明显过错,怎么办呢?

牟道夫心生一计。他把企业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带着经理来到武汉市市长办公室,拿出“不解决问题不走路”的架势。市长了解情况后,责成政府办公室协助工商局立即处理好此事。原来,牟道夫也有缠绵的一面,他把公司的处境、职工的困难、社会的稳定说得头头是道、句句煽情。最终,对方答应退还80%的货款128万元。

性格决定命运。牟道夫说:“我就是个闲不住的人,只要哪个要我去干工作我就特别兴奋,我这一辈子都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1992年离休后,他又被抽到达成铁路、河市机场、三汇大桥工程指挥部任办公室主任,一夜又是十年,十年里到底熬了多少个不眠夜,办了多少件事情,他已记不清了……

王崇地



浮世绘

5

版

视觉·故事

生活

周刊

编辑:廖晓梅
美编:廖晓梅

2008年10月25日 星期五
cristin@126.com 288642-405